

被寫進法律的“性教育”，離走進課堂還有多遠？

剛剛過去的“六一”兒童節，劉文利很忙。她忙着錄視頻發在B站上，介紹自己課題組的成員，還要忙着普及性教育知識。

作為“中國兒童性教育破冰者”、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的負責人，每年“六一”都是劉文利傳播性教育的重要時刻，她希望藉由“兒童節”，外界會對“性教育”的認識更多一些。

今年的“六一”意義又不同往常。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正式實施，首次在我國法律中規定學校和幼兒園要開展適合未成年人年齡的“性教育”；同日，教育部頒布《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其中提到學校要有針對性地開展青春期教育、性教育。

“這絕對是中國性教育歷史中值得紀念的日子。”對劉文利來說，奔走33年，這是她必須要取勝的“戰場”。盡管如此，在中國兒童性教育這條路上，還有很多挑戰待解。

“性教育”首次被列入法律條文 但談性色變仍存在

“我不想我的孩子在幼兒園就接受‘性教育’。”

幾年前，劉文利在推進性教育進入北京某幼兒園時，一位女童的家長不同意她的孩子接受性教育。理由是，她不知道性教育會對孩子產生什麼“影響”。

幼兒園園長和劉文利尊重家長的意見，於是全班二十多位小朋友上性教育課時，那位小朋友到別的班參加其他教學活動。對這種情況，劉文利“很遺憾，但并不意外。”

在中國，“談性色變”依然存在。

即便是放在今天，劉文利課題組成員在對外介紹自己是“性教育工作者”時也多少招致過不理解。“還是會帶有一定的偏見和局限性，在開辦課程或講座時也會遇到阻力。”

劉文利記得自己上小學時那個勉強算得上“性教育”的課，發生在小學五年級，學校請一位當地社區醫院的女醫生給全年級的女生做了一個講座，告訴她們女性每個月都有“例假”，大家甚至不知道這個學名叫“月經”，都以“倒霉”代替。

40年後，類似這樣的一幕仍普遍出現在如今的小學校中。今年，北京某小學請劉文利給小學五、六年級的學生做講座，但校方要求“男女分開”講，劉文利并不同意這樣的做法，校方也為難，擔心男女生合在一起講，家長會有意見。

劉文利很無奈，“你看，都過去了40多年，在性教育上仍然遮遮掩掩、不公開學習，這點還是沒有太大改變。”

長期以來，“性教育”這個字眼甚至很少被公開提及，取而代之的是“青春期教育”。

劉文利介紹，“青春期教育”英文翻譯是adolescence education，但在國際交流中，經常有國外學者聽不懂。國際上通用的“性教育”，英文翻譯應該是sexuality education。

劉文利也不認同“青春期教育”這種講法，她認為性教育是終其一生的教育，而不應僅僅設限在青春期。

這也是為何劉文利一直強調，今年具有裏程碑意義。接連的政策文件也為“性教

育”正名——首次出現在我國法律以及教育部的正式文件中。

在劉文利看來，“性教育”能進入法律，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它賦予了學者、媒體和各界人士公開闡釋它、討論它、研究它的權利和空間。

難以打開的學校大門

“性教育會講到社會性別平等，性別多元。對於建立尊重平等的這種人際關係，培養一種公平公正的態度來對待所有人的價值觀是非常重要的。”劉文利主張的“全面性教育”從身體發育延伸到人際關係、家庭關係，讓孩子建立身體尊嚴、知道自己的權利、尊重他人的權利。她認為，這對校園欺凌、家庭暴力等問題會起到一定緩解作用。

而在性教育效果監測調查中，劉文利發現，接受了六年小學性教育課的學生，能够在人際關係中更加公平對待和自己親疏關係不同的個體，與未接受性教育的孩子有顯著差異。

義務教育階段是劉文利不想放棄的性教育“主要陣地”。“性教育一定要基於課程，不是僅靠幾次活動就能完成的。是課程就要有課時、有教材、有老師、有教學效果的評價。這些全都是配套的。”

從2014年起，劉文利就開始與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合作研究“把性教育納入到義務課程體系”，由代表委員撰寫性教育提案，提交全國兩會。這項工作到今年她仍在堅持。

2018年，教育部的官方網站回應了代表委員。讓劉文利興奮的是，回復中直接使用“性教育”這個詞，沒有用別的詞來替代。

中國的性教育匱乏嗎？其實國內不缺少相關政策，在劉文利看來，問題在於沒有任何一個文件是單獨為性教育發布的。“跟性教育有關的內容都是散落在其他的政策文件當中，比如說預防艾滋病政策、計劃生育政策、預防校園欺凌政策和打擊兒童性侵害的政策，還有健康教育政策。”

在2011年，國務院發布的《中國兒童發展綱要（2011-2020年）》明確提出“把性與生殖健康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體系”。2017年國務院又頒布《“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提出“要以青少年為重點，開展性道德、性健康和性安全宣傳教育和幹預”。但這一政策并未規定性教育的課時。

沒有強制要求，相關教育又充滿爭議，許多學校就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

2007年，劉文利和團隊開始研發小學性教育課程并編寫性教育讀本，在北京某學校開展教學實驗。在確定這所學校之前，劉文利找了五六所學校，均被拒絕，“校長說從來沒做過性教育教學實驗，擔心家長不支持。”最終確定的該所學校，校長曾經與相關機構合作開展學校管理的課題研究，在教育觀念上比較開放。

知乎優秀答主胡佳威是一名兒童性教育老師，從事相關工作多年。他曾嘗試在無錫推廣性教育課程進小學。“太難了，能否順利推進完全取決於校方領導對性教育的態

度。”胡佳威說，如果對方重視，課時、經費、人員的問題都能解決；反之，即便學校條件很好，家長很願意，孩子很需要，也依然進不去。

目前胡佳威在無錫當地祇成功推進了3所學校，均為私立。“我們聚焦過公立學校，都是通過當地婦聯或團委介紹去聊的。但往往祇聊到教務主任這裏就被pass了。”胡佳威經常得到的回復是，“這些課程有些敏感，我需要上報討論一下。”之後就沒了下文。

從業者匱乏、全民爭議 性教育進課堂還有諸多挑戰

性教育進校園，除了校方的態度，師資力量也是個頭疼問題。

“非常匱乏，不單指專業的人，就連從業者都很少。”胡佳威在進學校前，第一件事就是培訓校內適合講性教育課的老師。他發現，即便是現在年輕的80、90後老師，在聊到這個話題依然會尷尬、面紅耳赤，認為很難啟齒。“他們能認可性教育重要，但他們不知道如何去引導學生。”

胡佳威認為，這和國內長久以來都沒有性教育的環境有很大關係。“我們大多數人從小跟父母也不會交流這方面，很多老師即便大學時候，也沒有進行過性教育的培訓。老師們在拿起課程時往往憋紅了臉，才對胡佳威擠出幾個字，“太難講了。”

這種境況，劉文利也遇上過。在北京某學校培訓老師階段，老師們對生殖器官的專有名詞不敢朗讀，劉文利就告訴大家，這些詞匯與鼻子、眼睛、嘴巴沒有任何區別。光朗讀這個環節就要持續幾輪——從心裏默念、小聲說，再到互相說，最後站在講臺前說。

家長的態度對性教育能否開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祇要班上有一個反對，性教育課程都難以開展。

胡佳威身邊一個學生家長曾在班級群號私邀專業老師開性教育課，却遭到另一位家長的強烈反彈。反對家長認為孩子太小不能上這種課，便投訴到了當地教育局。最終這事也沒能辦成。

“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是一張白紙，你開這種課，反而打開‘潘多拉魔盒’。”但胡佳威并不認同。他曾在六年級的課堂上徵集過學生的“悄悄話”，由他來回復答案。問題裏，孩子們對性行為表示好奇，問他“我可以發生性行為嗎？”，“處女膜是什麼？”胡佳威認為，並不是拒絕性教育課，孩子們就什麼都不了解，相反，開設課程、科學的講解，更有助於他們正視這件事。

劉文利從業這些年，不止一次面對家長的質疑，也給大量家長做過相關培訓——給他們看教材、普及“全面性教育”的理念，告訴他們，課上教授的所有的內容都是科學知識，有科學依據的。

但2017年她還是被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當年3月，杭州一所小學的家長拍了兩張劉文利主編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中的插圖發在了網上，在說到生殖器官的名稱時，用的都是科學名稱，如舉丸、陰道、子宮等。這位家長認為讀本的



尺度過大。

“性教育”第一次引發全網大規模爭議。之後劉文利在回應中寫道，“當一個身體器官的科學名稱都不能從大家嘴裏說出來，這個器官的結構和功能能得到正確的描述嗎？能够得到很好的尊重和保護嗎？當一個孩子遭受性侵害，他連什麼地方被觸摸都描述不清楚，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之後，劉文利和課題組飽受質疑，但也收獲了大量肯定和感謝。《珍愛生命》系列讀本甚至賣到脫銷。

事後劉文利却認為這事沒什麼不好。爭議把性教育帶到臺前，全民熱議的焦點也從“要不要開展性教育”到“如何開展性教育”。

更令劉文利備受鼓舞的是，在2018年6月，劉文利聯合北師大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學者劉超及其團隊對接受性教育的實驗學校進行了調查。統計發現，完整接受過6年全面性教育的這批學生性知識水平明顯高于沒接受過性教育的學生，對同性戀群體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有更少的歧視，表現出了更包容、更平等的態度。對同學、老師、家長的態度，都有一些讓他們覺得比較積極的、好的變化。

如今看來，中國性教育的發展已經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距離走進義務教育的課堂還有多遠，劉文利持比較樂觀的態度。“性教育寫進法律至少邁出了這一步，對我們之後再呼嘯、推進都奠定了重要基礎，不然性教育的地位都無從談起。”

胡佳威也認為，“性教育”正式出現在法律條文中，是一個好的開場。盡管對於從業者而言，并不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後續肯定會有更詳細的、更有積極影響的政策出臺。”

在未來的落實層面，劉文利形容“待解的問題非常緊迫”，比如什麼樣的性教育才是適合未成年人年齡的？誰來教？用什麼方法教？效果如何評價等等都需要逐步去落地。“這些都是非常具有挑戰的事。”

“最牛高考釘子戶”：發揮很不理想 明年將轉戰文科

6月9日，高考結束，記者再次聯系了梁實。據梁實透露，他今年的發揮很不理想，關於考試，他提及最多的就是“時間來不及”。

明年考慮轉戰文科

“英語作文祇寫了5分鐘，理綜接近三分之一的題做不完，數學也有一道沒做。題量大的讓人無法應對，做的一塌糊塗。”梁實稱，他今年打算直接不填報志願，明年再來，但明年會考慮轉戰文科。

“明年肯定比以往都要好，因為我對文科很有把握。畢竟它就是個記憶力問題，對於記憶力來說，我是高度自信的。”梁實說。

他表示，“從理解上來說，我比很多學生理解的透徹，是表達出了問題，平時強化訓練少出了問題。”

前幾年梁實曾揚言“目標院校

是川大數學系”，今年梁實透露稱“不一定是川大，川大祇是首選，好一點的二本也會上。”

關於高考之旅什麼時候終止，梁實回應稱，“沒有期限，我覺得如果說哪天我確實考不動了，就投降了，否則不會投降。”

考試結束當晚，他在微博中寫道：“謝謝大家的關心，理綜題量大時間緊確實惱火，今年發揮的不好！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川大等我。”

一邊打工一邊復習

梁實的老家在四川省眉山市仁壽縣文宮鎮高家公社。父母都是教師，梁實排行老四。他出生那年，父親被劃為“右派”，母親獨自撫養5個孩子長大。盡管家庭物質條件算不上充裕，但梁實的母親還是會訂《紅領巾》等少兒刊物，幼時

的梁實看了愛迪生、牛頓的故事，覺得他們都是有知識的人，很羨慕。

1983年，梁實在文宮中學報名參加高考，結果預考都沒有通過。不甘心的他跑到簡陽重新讀高一，讀了一年後參加高考，還是沒有考上。

1985年，梁實又到內江等地復習，當年也報名參加了高考。遺憾的是仍沒有考上。連續三次沒考上，梁實有點失落，他知道自己失敗的原因是不踏實，復習期間還想着玩耍，知識沒有吃透。總結了失敗原因後，梁實打算重新再來。他懊惱自己的貪玩，但家裏條件已經供不起他繼續念書了。他看到一位同窗好友因為家裏窮，祇復讀了一年便去打工，心裏覺得過意不去，也聽從家人安排開始討生活。

高考失利的梁實輾轉在內江、樂山和成都打零工。他修過機械，

砍過木材，還買賣過電視機，但唯一不變的就是一邊打工一邊復習。他每年1月準時到當地招辦報名參加考試，可遺憾的是連考了5年還是沒有考上。

曾通過成人高考

1992年，因為年齡限制和結婚，梁實不能參加高考。不能參加普通高考，梁實就參加成人高考。這次梁實很順利地通過考試，考上了南京林業大學成人教育學院。親戚朋友們為梁實終於圓大學夢高興時，梁實却高興不起來。他沒有去讀書，他說這不是他理想中的大學。梁實對大學的定義不同于其他人，他認為通過普通高考考上的重點大學才是真正的大學，成人高考考上的大學都不算。

2001年，教育部發文，進一步放寬高校招生報名條件，取消“未

婚，年齡一般不超過二十五周歲”的限制，報考普通高校年齡、婚否不限。這讓梁實平靜的心又激起了漣漪，“現在事業走上軌道了，可以花時間做點喜歡做的事情了。”他重新點燃了想考大學的念頭。

2002年，梁實再次報名參加了高考。不久，高考分數出來了，幾科加起來一共考了370多分。看到這個分數，梁實有了信心：“這麼久沒考試，能考到這個分數還是不錯。明年復習充分再來考試，說不定就會考上。”

後來幾年因為工作太忙，梁實祇在2006年參加了高考。這次考試比2002年多考了20多分。

2010年-2021年，梁實連續11年參加了高考。他並不覺得緊張，且總是信心滿滿，但結局往往不盡如人意。2011年，梁實的兒子和他一同參加高考，如今早已研究生畢業。